



时光

斜风细雨不须归

牛艺璇



郊外踏青的时候，一场细雨不期而至。

风传花信，雨濯春尘，大概是春天里最动人的场景了。此刻，细雨飘飘摇摇，时而落在青碧的枝叶上，时而停在幽香的花瓣间，晶莹剔透，无尘无埃，像是婴儿清澈透亮的眼眸，正在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暮春的秘密。

信步原野，让脚步慢一些，让时间缓缓流。微风过处，雨幕微斜，方才明了风为何是“斜风”。若风再狂荡一些，想必定会将会细雨吹散，顺着把人心吹乱，如此便失去了凝结在斜风细雨中的悠然之意。

那就且行且看，且从容且自在，把眼前的春色全部印刻进双眼。柳条纤细，像古代女子的水袖甩将开来，层层叠叠的枝条间，遮掩着万千朦朦胧胧的心事。而风便成了春天唯一的信使，它跨越万水千山，穿过岁月风尘，将春色中的每一丝心绪，巨细无遗地传递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让春色平等地观照着每一寸土地和每一个灵魂。

记得童年时代的春耕季节，当

耕牛打着沉重的响鼻，当父亲推着锃亮的犁铧，当解冻的泥土再次从大地深处泛起光明的希冀，淅淅沥沥的细雨总会如约而至。但这一场场贵如油的春雨，并没有吹响归家的讯号，反而像是冲锋的号角，让疲惫不堪的庄稼人再次热血沸腾，他们纷纷戴上斗笠，披上雨衣，趁着细雨正好，趁着斜风不燥，再次虔诚地压低腰身，匍匐在大地的怀抱之中，用勤劳与汗水播洒着绿油油的希望。

在乡村的斜风细雨中，我从未见到过行色匆匆的庄稼人。

每读张志和的《渔歌子》，总会因“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自在洒脱，而心向往之。江上渔夫，虽生于俗世，却毫不世俗，斜风细雨在为江面蒙上迷离色彩的同时，也给垂钓之人披上了一层难以揣度的神秘之感。只不过这种游离于天地之外的无拘无束，总感觉少了一些寻常人间的烟火气息。

直到后来又读到了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一遍遍诵读和一次次回想之后，东坡居士乐天知命、乐观豁达的形象，在我心头逐渐长成了阴翳葱茏的参天大树，那种在斜风细雨中我自悠然、不疾不徐的气度，让我这个在平凡生活中左冲右突之人，瞬间产生了自惭形秽之感。

朱光潜先生说，“现代人的毛病是勤有余劳，心无偶闲”，我深以为然。斜风常在，细雨常在，可雨中人却早已变得步履匆匆，逃也似的躲避这些清爽的风和如丝的雨，却不想，与此同时，也失去了人生中难得的平静与安宁。

斜风细雨是大自然的伟大恩赐，是印刻在无数个春天里最温柔、最多情的浪漫。不须归，既是遭遇困境后泰然处之的散淡，更是历经沉浮后笑着风云的豁达。在斜风细雨中悠然独行，把所有的张皇失措和蝇营狗苟暂时抛却，任凭斜风纵横，细雨濯身。此刻，天地之间，唯有风一阵、雨一场、我一人。

此便足矣。

舌尖上的乡愁

崔亚樵

顺口，可要是连着热上几回，外皮就软塌塌、发黏发腻，口感极差，简直难以下咽。

那时候多亏姐姐会变着花样收拾剩饭，她把热了好几顿的团子切一切炒一炒，做成炒团子，我们兄妹几个抢着吃，狼吞虎咽。那滋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实打实的美味。

上了小学五年级，我开始在镇上的中心小学住校。家里把石磨磨好的玉米面交到学校大灶，统一蒸成团子，我们排队打饭。那时候日子紧巴，农村孩子哪敢挑食？我们虽不像《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郝红梅在原西中学那般清苦，最起码能吃饱肚子，不用挨

饿。可对着那反复加热的黄团子，还是难以下咽。同学们给这黄澄澄的团子起了个外号——“黄大个”。在那个年代，白面大馒头，是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回的稀罕物。

1986年我上了初中，日子渐渐好起来了，学校大灶顿顿都是白面馒头，“黄大个”从此慢慢淡出了餐桌。

如今在陕北，不管是高档酒店，还是乡间农家乐，粗粮细做早已成了风尚，黄团子又出现在了餐桌上，可吃在了嘴里，却怎么也尝不出当年的滋味。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玉米面团子，养活了一代又一代陕北人。如今我们大部分家庭早已衣食无忧，反倒有人因为吃得太

好、营养过剩而患上了“四高”。可即便如此，真要连着吃几顿团子，口感终究不如白面顺口，粗粮与细粮，吃着还是不一样。

如今日子好了，白面大米也早已走进寻常百姓家，可每次想起当年的“黄大个”，心里依旧热乎乎的。它不只是一口果腹的粗粮，更是我们走过苦日子的真切见证，是刻在陕北人骨子里的乡愁与念想。无论走多远、过得多好，只要想起那一口黄团子，就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亲人，想起了那段朴素又踏实的岁月。

小小一个黄团子，装着陕北的烟火岁月，更藏着我们这代人再也回不去却永远忘不了的旧时光。

与虫子的“抗战”

姚丹

1969年至1977年，许多知青在陕北农村，经历了与虫子的“抗战”，也可谓“日持久、艰苦卓绝”。

1969年知青插队到农村，生产队还来不及给知青盖新窑，我们住的是当年中央电台的老窑洞。睡寒窑冷炕不适应，吃粗粮没菜不适应，干活苦重脏累不适应，但咬牙坚持都挺过来了。最可怕的事是遭遇各种虫子的骚扰和“侵袭”，令人苦不堪言，无可奈何，甚至束手无策。我们像当年抗战一样，打了一仗又一仗。

先是“虱子歼灭战”。劳动休息的时候，发现老乡们脱了上衣在里边寻找着什么？看见他们用手使劲地掐，发出不大的啪啪声，指甲上残留下点点血迹。一问，原来是在挤虱子。尽管十二分小心，还是防不胜防，我们也招上虱子了。这小东西藏在发间衣缝里，时不时骚扰你一下，虽然不疼，但浑身不自在，心里犯膈应。为了消灭它们，我们找来敌敌畏稀释，将衣服全部分批浸泡，又用稀释后的敌敌畏水洗头，然后湿毛巾捂在头发上，反反复复搞了好几次，才彻底把它们消灭掉。

创办窑洞小学时，我看到每个女娃娃头上都有一层白花花的虻子，心里不舒服。虻子是虱子的卵，有虻子就说明孩子们会被虱子骚扰，无法静心上课。我决心带领他们打一场“歼灭战”。首先带领他们上文明卫生课，讲卫生常识。在硷畔上支起大铁锅烧水给他们洗头，给男娃娃们理了发，给女娃娃们剪了虻子。看着孩子们干干净净坐在教室里上课，心里踏实舒服多了。

河庄坪生产队的老书记曾和我

拉话时说过：“你们北京知青的到来，让我们这达（这里）的文明提前了二十年。”琢磨起来还真是这么回事，北京知青到陕北农村，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老乡们的一些卫生陋习。比如刷牙、妇女用卫生纸、穿内衣内裤等等，虽然是些不起眼的小事，但也是对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再说说与蝎子的一次“遭遇战”。蝎子不像虱子那么多那么难缠，但蛰上一次就不得了。我的同学孙炼在一次劳动中不小心被蝎子蜇了。晚上无法入睡，疼得抱着腿直哭，我们跑到邻居薛大爷家讨办法。薛大爷说：“娃们，蝎子咬人可疼咧，赶紧找热烟油子抹上试试，不行再去找潮虫（西瓜虫）放在蝎子咬的地方，让它把毒液吸出来会好些。”我们先去找了热烟油给孙炼抹上，半天不见缓解，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几个人也急得直转磨，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潮虫呢？忽然想起隔壁男生窑洞里又潮又脏，说不定会有。便起身去敲隔壁男生的窑门。

十七八岁的男孩睡得多，加上干了一天活，又困又乏，半天才起来开了门。我们不由分说闯进去，发现地上有一堆鞋，不管三七二十一蹲下就翻。男生睡眼惺忪地问：“你们干嘛？半夜三更不睡觉，找啥呢？”我们边说：“找潮虫！”边掀开鞋堆，果然发现有潮虫在爬，兴奋地抓了几只，如获至宝跑回窑洞。挑了一只小点的放在孙炼腿被咬的地方。只见潮虫真的在那儿吮吮起来，过了一会，孙炼说：“这招顶事，好些了。”几个人都长长出了一口气。几乎折腾了大半晚上，大伙都疲惫不堪。由于没休息好，一整天头都是昏沉沉的，干活无精打采，都是这可恶的蝎子害的！

我在农村插队工作了七八个年头，最难熬最漫长的战斗是与跳蚤的“持久战”，堪称“八年磨战”。

跳蚤是到陕北农村以后才遭遇的一种虫子。许多知青被咬得惨不忍睹，浑身是包。问老乡是什么咬的？老乡说是“圪蚤”（跳蚤）咬的，陕北人管跳蚤叫圪蚤。我们住的老旧窑洞，破旧而潮湿，炕道损毁烧不热，加上老乡家豢养牲畜，特别容易滋生跳蚤。

有个奇怪的现象，到现在也无法解释。跳蚤为什么不咬老乡专咬知青？就说住在一个窑洞里的知青，被咬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我们挨排睡了四个人，一个基本不被咬，一个偶尔被咬，我和孙炼则被咬得最惨。

跳蚤咬的包和蚊子咬的包感觉不太一样，红肿处还拖个小尾巴。不但痒还有一种灼热疼痛的感觉。痒起来不知挠哪里是好。有时干脆拿着针或小棍儿一通乱扎，后来发现用干玉米芯子浑身上下搓才解气，不少知青都有这种体验，有时大家集体开搓，搓得火辣辣的才痛快。

殊不知搓破的地方容易感染。我身上的红包上面顶出了白色的脓头，两条腿像灌了铅，沉得挪不动步，头昏沉沉的，浑身发冷打颤，孙炼陪我去了一地区医院。一量体温，39度，发高烧了。大夫说：“孩子，你这是感染了，处理不好会得败血症，很危险的！来，快坐下，我给你处理一下。”

那个大夫开始给我消毒，用镊子一个个把脓头去掉，再涂上药，包扎好，整整处理了三个小时。身上顿时轻松了，腿也不那么紧绷了。大夫又开了消炎药嘱咐我回去好好吃，别大意，不好再来看。我和孙炼都很感动，觉得这个大夫认真负责，态度和蔼，医德很好。打问到大夫的名字叫崔立



走过青春

本。回队痊愈后，我到果园买了一大筐黄元帅苹果，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医院政工组，表示对崔大夫的感谢。

这次好了，但与跳蚤的战斗并没有结束。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往炕上撒点六六粉，一试果然奏效。我举一反三，干脆把六六粉缝在褥子里，跳蚤就不敢近身了。

到公社工作后经常下乡，不能背着褥子到处跑。又被咬得浑身稀烂，苦不堪言。被逼无奈，我又想出新的办法。到卫生院买了小瓶液体敌敌畏，走哪带到哪，睡前淋洒上一圈，让跳蚤闻而却步。这个方法也有作用，沿用了好几年。

殊不知，跳蚤被毒死的同时，自己也在慢性中毒。进城工作后，因为我患有关节炎，组织上专门在平房里给我盘了一个小炕，每当烧火，屋子里便弥漫出六六粉的味道，同志们都说呛得受不了，我似乎早已经适应习惯了。男朋友说：“你脸色不好，跟这慢性中毒或许有关。”让我把六六粉褥子扔掉。我有些舍不得，有了它，少遭了不少跳蚤的骚扰。直到结婚后，才把六六粉褥子换掉了。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有句名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反过来说，就是说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不同的环境。当年在农村，与天斗、与地斗、与虫斗，无处逃避也无法躲避，只能想方设法与各种虫子抗争。这是知青岁月一段不得不提的经历。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强调逆境中培养才能，与虫子的“抗战”，也是逆境中的一种磨练，我们抗争了，承受了，熬过来也成长了。



黄土风情

陕北民歌注(节选)

史小溪

大红果子剥皮皮

大红果子剥皮皮^①，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二人没关系咧哟，好人担了些赖名誉^②。……

这是一首古老的陕北民歌。有点酸味，属酸曲一类。深受陕北当地人的喜欢，广泛流传。

陕北北部地处黄土高原与草原交界过渡带，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汇地带。民歌是陕北独特地理环境、社会变迁和人文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鲜明特色的歌曲。从陕北丰富多彩的民歌中你可以感受到它完美地吸收与融入了那些粗犷奔放、高亢悠扬的音乐文化元素。

这首具有陕北文化特色的民歌，热烈泼辣，诙谐风趣。“三月里桃花鸟嘴嘴，剥了皮皮流水水。”象征男女朋友的俊美、鲜活、青春。这首歌在具体演唱中，有的歌手还加了独白，夸张、诙谐、活泼，获得好评。如独白：“你大你妈爱银钱，给你寻了个老汉汉。又抽洋烟又赌钱，倒灶鬼，误了你青春好华年。”老汉汉，在陕北指上了年纪的老头；倒灶鬼，倒灶，陕北方言，类同背运、倒霉，古汉语中多用，如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说：“你遇着我该倒灶，与我何干。”陕北方言中倒灶泛指不顺心、烦人、倒霉，但又不是具体的倒霉，倒霉指具体一事情，倒灶则指不可逆转的命运。又如独白：“麻雀雀落在黄蒿林，二不愣后生跟一群。死皮赖脸说长短，挨刀子货，我看他们不是些正经人……”黄蒿，一种野生的蒿草，多长在深沟、沟渠，春夏绿色、黄绿色，秋天逐渐呈黄褐色，农家烧柴用。人云：林茂鸟知归，黄蒿林自是鸟雀藏栖之处。二不愣，陕北方言指那些举止鲁莽、愣头笨脑、说话冒冒失失、做事不很精明的人。后生，专指青年男子、年轻人，年龄偏小的叫小后生。挨刀子货、砍脑鬼，都是陕北骂人的土语。

当代有一些歌手根据此曲调改编成其他词句，如：“大红果子剥皮皮，人人都说榆林美。退耕还林它满山山绿——咧儿呀，瓜果枣梨种下一渠。”虽然紧跟退耕还林的形势了，歌颂朗朗，却太表象肤浅，与这首歌最原始的初心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失去了原词句中那种淳朴、率真、亲和，那种充沛的人性自由，野性的生命燃烧，鲜活跳跃的精灵。许多信天游如“东山上核桃西山枣，两杯杯烧酒你不能少”“几个月我没见你的人影影，我去黑龙潭庙问神神”，一听就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是生活酿造搓揉出来的。这也正是许多传统信天游叫人喜欢的最可贵之处。

文学艺术，鲜明的时代感、注重现实，或抒发“小我”深情情吟，宛若南宋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精致优美，小巧玲珑。或宣泄忧国忧民的情感看看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欧仁·鲍狄埃《国际歌》的歌词，那是多么宏美、悲壮、不朽，像史诗一样澎湃心灵的词语！而那些浅显的图解生活的创作，以及盲目歌颂一个短暂时期的政策一类的颂词，肯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① 大红果子，寓意着活力、饱满和热情。在陕北俗语里，有把男性生殖器隐喻为苹果的。信天游曲中有许多唱词也有，如：你亲我的苹果我揣你的奶……

② 赖名誉，不好的名声。本来咱俩没有关系，没那回事，却在背后被人吵得风言风语添油加醋，白白地被诬蔑栽赃，沾了一身臊气。

揽工调

揽工儿^①人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十个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是猪狗饭。……

民歌，是劳动人民心底的呼声，是广大农民的悲愤也是哀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揽工是旧时农村没有土地的农民，或无地、少地种的大部分农人迫不得已出卖劳动力，与地主富农签订或口头契约关系，从事农活及其他劳役，一般常从正月到十月乃至年底。穷人沦为雇工，成为富人做工的一种劳动工具、生产力。这是一种劳动形式也是生存方式。

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爆发革命斗争，是封建社会、半封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陕北民歌从各个方面集中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愤恨、反抗情绪。《揽工调》就是这类作品的典范，他是穷人愤怒的呼喊。揽工人儿难，处处受人白眼，窝囊受气。揽工人儿苦，只能是混个饭碗，因为他们所创造的劳动果实，大多被富人掠夺、占有。陕北是天底下的苦海地方。当年在延安县插过队的北京知青作家谢侯在他的散文《樵树岭》写道：“第一次到陕北，才看到苦情日子，野菜、草根、杏叶、苍苗儿，能吃的他们都吃，面黄肌瘦。大锅稀汤能映出人影儿来，能吃南瓜、红薯那是难得的享受……真正让知青震撼的，是这群躯体中候着的灵魂。这是钉在这黄土山岭上的魂儿。再咋的苦情，咋的受罪，都平静着，麻木着，并无嚎叫不甘，认下，受下，顺了死生，随了命定。你暗中感受到那种承受苦难的能量，那能量极其巨大，无底得我恐惧。”谢侯之写这些都是1969年了，陕北乡民的真实现状尚且如此，你可以想见在遥远的古代，遇到大旱逃荒，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他们蹇涩的命运。而所说的揽工人，更是沦落流浪那一群体的农人，他们衣衫褴褛，凭借出体力浑噩度日，更可见他们的苦，以及生活和精神上背负的双重枷锁。

揽工题材是陕北民歌的文化精粹。这类民歌在陕北民歌中比重很大，如《十二月熬活》《十揽工》等，都以苍劲、悲凉、浑厚、质朴的旋律和沉重的词语展现了他们生活的苦难与感情挣扎，真实记载和反映了穷苦农民的辛苦、心酸、穷人没理，也没平等。这反映了揭露了地主、富农剥削阶级对穷苦农民的剥削，他们蔑视揽工人，暴露出奸诈、虚伪、巧取豪夺、唯利是图的反动本性。

① 揽工人，也叫长工。即有契约关系，沦为生产力或生产工具的穷苦农民。